

生活好滋味

董宁

这几日，不凉不热，风里带着点桂花

的甜香，飘得满街都是。早起到巷口买油条，见巷尾的老槐树底下，王大爷正踮着脚挂国旗。红绸子在风里晃了晃，衬得他灰扑扑的棉袄也亮堂了些。“丫头早啊！”他笑着打招呼，手里的竹竿还举着，“今儿国庆，挂面旗，看着喜庆。”

我应着，买了两根油条，热乎的，咬一口脆生生的。卖油条的李婶也挂了串小红灯笼，玻璃纸的，太阳底下闪着光。“国庆了，孩子们都回来，多点点油条备着。”她手上麻利地翻着油条，油锅里的泡泡滋滋响，“你看街那头，昨儿就开始搭戏台了，晚上有评弹呢”顺着她指的方向看，果然见街口搭了个简易戏台，蓝布幔子上绣着“欢度国庆”四个黄字，针脚不算齐整，倒透着股实在劲儿。几个穿蓝布衫的师傅正搬箱子，里面是锣鼓家伙，叮叮当当的，引得路过的孩子围着看。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伸手想去摸鼓槌，被她娘轻轻拍了下手：“别闹，师傅们忙着呢，晚上带你来听戏。”

午后无事，去巷外的小公园转。公园里的月季开得正好，红的、粉的、黄的，挤在花坛里，热热闹闹的。有几位老太太坐在长椅上晒太阳，手里织着毛衣，嘴里聊着家常。“我家孙子昨天从北京回来，带了袋糖炒栗子，你尝尝。”一位老太太说着，从布兜里掏出个纸包，分给众人。栗子还带着点温乎气，剥一个放嘴里，甜得很。

“听说晚上广场有烟花？”另一位老太太问。“可不是嘛，昨儿居委会的小张来通知了，让早点去占位置。”“那得早点做饭，吃完就去，别让孩子们等急了。”她们说着，脸上都带着笑，阳光落在花白的头发上，暖融融的。

傍晚，街上渐渐热闹起来。大人牵着孩子，手里拿着气球，红的、黄的、粉的，飘在半空中，像一串会飞的糖葫芦。街角的小饭馆挂出了国庆特惠的牌子，玻璃窗上贴着红剪纸，剪的是天安门和五角星，手艺不算精巧，却透着股热乎劲儿。饭馆里坐满了人，笑声和菜香飘出来，混着街上的人声，格外热闹。

我也随着人流往广场去，路上遇见卖糖画的老周。他还是那样，坐在小马扎上，面前摆着个铜锅，锅里熬着琥珀色的糖稀。“丫头，来个糖画？”他笑着问，手里的勺子在青石板上晃了晃，“今儿国庆，给你画个五角星。”我点头应着，看他手腕一转，糖稀顺着勺尖流下来，很快就画出个棱角分明的五角星，再粘个竹签，递到我手里。咬一口，甜得发腻，却让人想起小时候的日子。

到广场的时候，人已经很多了。大家三三两两地坐着，有的吃着瓜子，有的聊着天，孩子们在人群里跑着闹着，手里的荧光棒闪着光。忽然，音乐响了起来，是《我和我的祖国》，熟悉的旋律一出来，广场上渐渐安静下来，有人跟着轻轻唱，声音越来越大，最后汇成一片合唱，在夜空中飘着，暖暖的。

不一会儿，烟花升起来了。先是一朵红色的，在夜空里炸开，像一朵盛开的牡丹，接着是黄色的、绿色的、紫色的，一朵接着一朵，把夜空染得五颜六色。孩子们欢呼着，举起手里的气球，大人们也拿出手机拍照，脸上都带着笑。我站在人群里，看着漫天的烟花，嘴里还留着糖画的甜味，风里飘着桂花的香，忽然觉得，这样的日子，真好。

烟花散了之后，人们慢慢往回走。街上还是热闹的，路灯亮着，映着路边的国旗，红得格外好看。有个小姑娘拉着她爸爸的手，仰着头问：“爸爸，国庆是什么呀？”她爸爸蹲下来，指着天上的月亮，又指着路边的国旗，笑着说：“国庆啊，就是咱们国家的生日，是个开心的日子，就像你过生日一样，大家都要庆祝。”小姑娘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又蹦蹦跳跳地往前跑。

我走着，看着身边的人，看着街上的灯火，心里暖暖的。国庆节的街上挂着国旗，巷里飘着桂香，家人朋友聚在一起，看看烟花，听听戏，这样的日子，平淡又热闹，温暖又踏实，真是人生好滋味。

母亲和她的那面国旗

葛鑫

1960年代，母亲在鲁中山区一所不起眼的小学教书，那时她刚从师范学校毕业，怀揣着梦想与热忱。

那时的山村学校，教师如同荒漠中的甘泉，珍贵且稀缺。母亲以一介柔弱之躯，挑起了山村教育的重担，她不仅教孩子们语文、数学，还是他们心灵的引路人。

母亲常言，山外的世界宽广无垠，她愿做那座桥，让孩子们能够跨过重重山峦，看见更广阔的天地。于是，在无数个黄昏与黎明，她用最质朴的语言，为孩子们描绘着北京天安门的雄伟，讲述着毛主席的伟大，还有那面在风中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是多么的鲜艳……每当这时，母亲的眼中总是闪烁着光芒，那光芒，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照亮了孩子们心中的梦想。

然而，在那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山村小学里连一面国旗都没有。每当提及五星红旗，孩子们的眼中总会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失落与向往。这份细微的情感，母亲看在眼里，记

在心里。她暗自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为孩子们找来一面国旗，让那抹鲜艳的红，成为他们心中的骄傲。

于是，母亲踏上了漫长的求旗之路。她给远方的同学写信，一封封满载着希望的信笺，如同鸽群般飞向远方。周末，天未破晓，母亲便踏上了崎岖的山路，乘坐那颠簸不已的拖拉机，前往60里外的县城。母亲的脚步异常坚定，因为她知道，那面国旗，不仅仅是孩子们心中的期盼，更是她作为一名教师，对孩子们最深沉的爱与责任。

终于，母亲从同学手中接过了那面梦寐以求的五星红旗。那一刻，她的眼眶湿润了。她小心翼翼地将国旗包裹好，生怕有丝毫的褶皱，仿佛那是世间最珍贵的宝物。归途匆匆，母亲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让孩子们尽快看到这面鲜艳的国旗。

回到村里，夜幕降临，母亲不顾疲惫，立即找到了村长，请求帮忙制作旗杆。在众人的帮助

国庆专刊



丰收之后的大地 白英 摄

虚惊

邴继福

秀花姑娘嫁出的第七天，男人拴柱就要开赴抗美援朝战场了。

临别的前夜，秀花一宿没睡好。她哭肿了眼睛，抚着男人的胸口一个劲儿磨叨：咱小山村没有一个识文断字的，你到朝鲜那儿也不用求人往家捎信，只要心里记着我就行啊！

乡里的一挂带铃铛的马车，把戴大红花的栓柱拉走啦，就像拉走了秀花的魂。

那之后，秀花时常孤零零地站在村头的大杨树

树下，瞅着伸向远方的大道出神……

秀花时时刻刻想着拴柱。在婆婆家待寂寞了，就往三里外的南屯娘家跑。

娘家邻居二丫的男人出担架，也去了朝鲜。两人同病相怜，常在一起念叨自己的男人。

二丫，你想他不？

咋不想呢，天天做梦都和他在一起。秀花，你呢？

秀花面矮，磨不开，只是红着脸低头一笑，便陷入了甜蜜的回忆之中。

思念的日子真是难熬啊！

突然有一天，二丫家传出噩耗：他的男人抬担架时，被美国鬼子的飞机扔炸弹炸死了。

消息来自乡邮递员送来的大信封，信封里装着阵亡通知书，秀花曾经亲眼看见过那个大信封，上面的字，她一个也不认识。

那以后，秀花最害怕见到邮递员，害怕见到那样的大信封，她怕二丫的倒霉事轮到自己头上。事情真怪，越是害怕，越是躲不过去。

一天，秀花铲地回来，见婆婆捧着个大信封，和二丫收到的信封差不多，说是乡邮递员刚刚送来的。

还没等打开信封，秀花的脑袋就“嗡”的一下，身子一晃，瘫倒在地：完了，自己的男人肯定死了。

公公婆婆看见了那封信，虽然不认字，但看到秀花已经晕倒，已经猜测到了：儿子肯定凶多吉少，也哭成了泪人。

全村人被哭声引来，都断定，栓柱和二丫的男人一样，肯定也是被美国飞机扔炸弹炸死啦，要不然，秀花不能这么悲痛。于是，大家便开始张罗给栓柱办丧事。

他们把结婚照上栓柱的相剪下来当遗像，买了一些黄表纸，连同那个带给他们灾难的大信封一同烧掉。一时间，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被悲哀

下，一根虽简陋却结实的旗杆拔地而起，矗立在学校小小的操场上。

1964年的国庆节，一个让母亲铭记终生的日子。那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照耀在山村小学的操场上时，整个村庄都沸腾了。村民们和孩子们早早地聚集在这里，脸上洋溢着前所未有的期待与激动。在母亲的精心筹备下，一场简单而庄重的升旗仪式即将举行。

随着母亲一声令下，国歌响起，那是孩子们稚嫩却坚定的歌声，悠扬的童声在山谷间回荡，仿佛连风也为之动容。两个高年级的孩子，手拉着绳子，缓缓升起那面来之不易的五星红旗。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那面迎风招展的国旗上。

孩子们抬头仰望着五星红旗，眼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那是对祖国的热爱，对未来的无限憧憬。那面国旗，在晨风中猎猎作响，它不仅飘扬在山村小学的上空，更深深烙印在每一个山区孩子的心中，成为他们成长路上最坚实的信仰。

岁月如梭，转眼间，六十多年过去，当年的孩子早已成了爷爷奶奶，母亲也已去世。但那面国旗，以及母亲与国旗之间的故事，却如同陈年的酒，越品越醇厚。它见证了山村的变迁，也见证了孩子们的成长与蜕变。而我的母亲，她的爱，如同那面永不褪色的国旗，永远飘扬在了山区孩子的心中。

的气氛笼罩。

死的去了，活的还得好好生活。拴住的父母抹干眼泪，仍然在田里劳作。秀花像换了个人，成天以泪洗面，还不时站在村口的老杨树下，瞅着远方的大路发呆。

父母怕秀花想不开寻短见，琢磨着给她找个新主，问秀花同意不，秀花眼傻了似的，一声不吭。

一年之后，由老人做主，硬把秀花嫁给一个比她大十多岁的老光棍。

喜庆的喇叭声再也激不起秀花的一点情绪。爹妈在接亲的马车后送了老远，一个劲儿跟秀花叮嘱：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可得乐呵一点呀……

马车渐渐远去，喇叭声渐渐弱了。突然，从马车那边传来了撕心裂肺的哭叫声。

村人连忙奔去，立刻惊呆了。原来，秀花正在同一个穿黄军装的男人抱头痛哭。细看时，那个男人不是别人，正是秀花已经“死去”的丈夫——拴柱。

这工夫，胸戴红花的新郎羊信傻愣愣地看着，一声不吭；拉车的白洋马瞪着迷茫的眼睛，不知发生了啥事儿！

拴柱啊，一年前，我收到了和二丫一样的大信封，村上没有一个识字的，里边的信看都没细看，就以为你也死在朝鲜了……

秀花呀，信封里的内容大不一样，给二丫邮来的，是“阵亡通知书”；给你邮来的，是我的“立功喜报”。

出那面叠得方方正正的小国旗，把它贴在板房最显眼的位置。

他说：“咱们跨洋过海来这里，代表的是中国。这旗子在哪，咱们的根就在哪。问题再难，能难得过我们先辈走的路吗？”没有人欢呼，但所有人沉默地坐直了身体。那面小小的、红色的旗，像一团火，把快要熄灭的心气重新点燃。

后来难题攻克，项目顺利推进。老爸回国时，那面国旗被他用透明塑料袋仔仔细封好，带回了家。它旧了，边角有些磨损，但依旧干净平整。他说：“那段时间，它就是咱们的国境线。看见它，就知道家不远。”

如今老爸退休了，生活节奏慢了下来，但对国旗的敬重却丝毫未减。

每年国庆前一周，他一定会选个晴朗的日子，郑重地将国旗请出来。他挂旗不像别人随便一插了事，而是像完成一桩仪式：先检查旗面是否完好，再抚平每一处折痕，然后稳稳地固定在房檐的旗杆上。

那一刻，我忽然理解了他——他们这一代人，亲身经历过国家的贫弱与崛起，他们的爱国，是具体的、有温度的。国旗于他，不是符号，而是战友、是故乡、是信仰，是贯穿一生的温柔坚守。

1954年国庆节

素洁口述，龙玉纯整理

我是1950年10月参军的，我清楚记得当时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庆节，47军140师420团宣传队来到我就读的省立十中与同学们联欢，我作为校队的文艺骨干参加联欢演出。宣传队队长来到我们同学们中间，想在我们中选几名小演员，希望我们参军，我不假思索一口就答应了。后来虽然学校、家长极力挽留，希望我完成学业，但我还是放弃了甲等人民助学金的优等生待遇，义无反顾地到了部队，成了一名十四岁的小兵。入伍不到三个月，47军就接到命令，入朝作战，我又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朝鲜战场上的战斗是激烈和残酷的，可以说完全出乎我的想像，由于刚开始志愿军的后勤保障跟不上，我这个志愿军宣传员除了白天找合适的机会表演小节目给战友们加油鼓劲外，还兼职做起了战地救护员。在临津江东岸防御作战中，我所在的后勤和机关的同志们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顶住敌机的狂轰乱炸，将数万吨弹药、粮食、被装送上前线阵地，将近万名伤员抢救下来，及时送到后方救治，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障。

在朝鲜参战的三年半时间里，虽然随时都经历着生死考验，但我还是一直坚持从事战地救护和宣传鼓动工作，直到1954年9月，我作为47军140师宣传队的一员，享受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批公开回国这一殊荣。要回国了！“祖国”这个名词，身在祖国的人们体会可能不那么真切，可对于远离祖国身在朝鲜战场的我们来说，她真的等同于母亲，是那么的亲切，那么让人贴心思念。如今带着“最可爱的人”的荣耀，我就要回到她的怀抱了，那种激动喜悦的心情难以言表。

当彩装的火车轰轰隆隆、敲锣打鼓、载歌载舞通过鸭绿江大桥的时候，我们的心激动到了极点。我是“偷渡”入朝的小女兵（领导不去，我混在部队货车中去的朝鲜），没有看见过鸭绿江大桥的真面貌。这次我可看清了，在这座桥的中间，有一个高悬的明显标志，北面挂着朝鲜国旗，南面挂着中国的五星红旗，这个国籍分界线是那样的庄严醒目，对我们志愿军来说却是一家人般亲切。我们通过这分界线时，都激动得尖叫起来。

九月下旬，我随47军回到了湖南，回到了我的故乡。我永远也忘不了1954年国庆节的那一天。那天的太阳特别明亮，可能是那几年在朝鲜过惯了北方秋高气爽的日子，有点承受不了这热烈的太阳。可偏偏我们宣传队去参加国庆节游行和庆典时，必须充当仪仗队，要穿上那套威武挺拔、扎武装带、配长筒靴的人字呢队服，那形象当然英姿飒爽、神采奕奕，可是要敲锣打鼓、载歌载舞上街游行，还要接着参加近两个小时国庆庆典大会，真的好辛苦，但我们心里都十分兴奋。沿街满是人群，无数鲜花向我们抛来，“欢迎志愿军光荣归国”“最可爱的人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等口号震天动地，到处人山人海，鞭炮声、锣鼓声、欢呼声沸腾了整个城市。幸好耒阳城不大，不慌不忙走来，一个多小时就游行完了。就这样，到达举行庆典的操场时，我们的衣服早已让汗水浸透了。

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的庆典会场其实很简陋，露天草地广场前面搭起个主席台，下面没有凳子椅子，在庄严的国歌响起，升旗仪式结束后，我们全体指战员都听令席地而坐。地上滚烫的，头顶骄阳似火，一个多小时的庆典暨欢迎仪式，热烈而庄重。我们宣传队坐在最前面，所以坐得笔挺的，虫子在臀下爬也不敢扭动一下。汗水从发根处涌出，顺着脸颊汩汩下流，脖子痒痒的也不去擦它，流到眉眼间，眨眨眼睛，流到嘴角边，尝尝咸味。热烈的国庆一天过去了，晚上我们又参加了当地的联欢晚会，表演了许多精彩的节目，直到午夜近十二点才回到驻地休息。

夜深了，很累了，可我却怎么也睡不着。朝鲜人民的深厚情谊，祖国人民的关怀热爱；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和平国土的繁荣景象，如电影般在我脑海中反复上演……这个不平凡的国庆节，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荣耀，享受到了至今难忘的幸福。